

●张梅岗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

Translation of Functions

汉

Translation of Functions

功

Translation of Functions

能

Translation of Functions

翻

Translation of Functions

译

Translation of Functions

TRANSLATION
OF
FUNCTIONS

英汉功能翻译

●张梅岗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Translation of Functions

张梅岗教授赠
存系图书馆

英汉功能翻译

著 者:张梅岗

责任编辑:唐乘花

出版发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http://www.hnstp.com>

邮购联系:本社服务部 0731—4441720

印 刷: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

厂 址:邵阳市双坡岭

邮 编:422001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出版日期: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0.375

字 数:257000

印 数:1~2400

书 号:ISBN 7-5357-2550-3/H·89

定 价:17.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翻译”，按《辞海》的解释，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但是如何来“表达”，对这个词的界定令世人绞尽脑汁，煞费苦心。1997年刚出版的《中国翻译词典》，却是用了这样一段话来“表达”：“翻译(translation)是语言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把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内容变为另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过程或结果，或者说把用一种语言材料构成的文本用另一种语言准确而完整地再现出来。”如何“再现”呢？有的说它是“艺术”，有的说它是“科学”，也有的说它“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我们认为，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不容轻易否定。要说明“翻译”的根本性质，不能一概而论。“翻译”的属性不同，就包含着不同的概念，例如：文学翻译、科技翻译、商务翻译、法律翻译等。就翻译学而言，也包含种种。例如：萨瓦里把翻译分为完美翻译，等值翻译，综合翻译，科技翻译等。威尔斯则分为普通翻译学，描写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黄忠廉等学者在解释翻译本质时，提出了变体翻译理论，简称“变”译，所谓变译，指的是译者根据读者的需求对一种语言文字的信息采用扩充、取舍、浓缩、补充、合并、改造等方法传达信息的中心内容或部分内容的翻译活动，它包括摘译、编译、译述、综述、述评、改译、译评、阐释、译写、写

译、参考译等十余种类型。变译类型的形象说法是：

展示精华——摘译；浓缩精华——编译；转述精华——译述；综合叙述——综述；综述评论——述评；译中有评——评译；改头换面——改译；译而扩充——阐释；译结合写：译写；引译作据——参考译。

这些学术观点在最近两年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上发表时，都引起了同仁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我们充分赞同把翻译实践和翻译学统一起来进行研究。因为翻译学是翻译实践活动的规律性的总结，是客观规律的系统的知识体系，从而又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具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性。

作者张梅岗教授1968年于湖南师大毕业，30多年来十分勤于笔耕，已有十余种著述问世。他在本书里把翻译学分为两类进行研究：即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把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等文学艺术与科技、商务、经贸、法律和合同标书等科学英语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分开来进行研究，实属开拓性探索；这种分类是有理论依据的。第一，就文体风格来说，前一类在于“虚”，强调艺术形式，艺术风格的独特性，追求艺术效果；后者在于“实”，突出表达的准确性、逻辑性，追求逻辑思想的完美；第二，在语言结构上，前者丰富多彩，多姿多色；后者规范条理，言简意赅；第三，在思维逻辑上，前者强调形象思维，语言形象活灵活现；后者强调逻辑思维，概念准确，逻辑流畅；第四，就作用和目的而言，前者在于教育人们，陶冶人们的情操；后者在于揭示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当然两者有相同之处，因为它们是同一个“家族”中的两个成员。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贤教授所说，“文学翻译

和科技翻译是存在着共性和个性上的异同的。”

分门别类，进行翻译研究是符合语言的根本规律的。因为“在一类人中，说话的思想语法是十分相同的。”(Steven Pinker) 科学家，技术员是同类人，在谈论同一个问题时，思想语法是一致的。但是心理学家的研究又告诉我们：人的头脑思维和心理活动是十分复杂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个性，而个性心理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常常是在同一学识翻译水平的人，译出来的同一部著作在语言风格上往往仍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在研讨翻译学时切不可忽视对语言学和逻辑学的思维研究。

本书恰好是一部用崭新的思想和方法研究翻译学的专著，着重阐述了“指导翻译实践的基本原则是修辞功能等值；研究翻译的基础理论是现代语言学和思维逻辑学。”

在语言上，作者把科学语言分为五大类修辞功能和若干类小功能，从修辞形式入手，弄清修辞产生的语言功能，实现功能对等翻译，系统地描述了从“形”求“神”，“神”高于“形”辩证统一的原则，这个“形”是指“修辞”，指逻辑，不是指词汇和语法，因为语言的模糊往往体现在词汇和句法上，正如《语言的本能》一书所说，语法常常把语义割裂开来，不能完整地表达语义。在语言逻辑上探讨了翻译的逻辑单元（“积木”），逻辑语法，逻辑结构，逻辑模块和逻辑链。在翻译的逻辑思维过程中，从语言的本能入手，处处运用了形式逻辑，辩证逻辑，事理逻辑和科学逻辑，以及怎样进行翻译的逻辑思维活动。

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种种观点和理论决非空谈和抽象的定义，而是经过正确可靠的论证，并在翻译界最具权

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系列论文达 15 篇之多。例如：积木结构，核句、SVO 句、因果链、关系从句、补语结构句等翻译理论和方法都是作者个人独创，具有颇高的理论价值和实用意义。

本书在诸如增译、省译、重复等传统翻译技巧和方法上，不是一味机械地继承，而是有所进步，有所发扬，比较详细地阐明了运用那些翻译技巧的理据和语言条件，从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因此，本书从普通翻译学观点来说也是一部成功之作。

中国科学院钱临照院士说过，“要探索和发展中国的翻译学”，在这方面，作者已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并且在不断总结出新的成果来，实在可喜可贺，谨为此作序。

李亚舒 于中国科学院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卅日

一 译学的性质

译学是一门综合学科，涉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数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因此人们对翻译学的认识，各持己见，莫衷一是。有的说它是科学，有的说它是艺术，也有的说它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林语堂于1932年写的《论翻译》，是他译论的代表作，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没有什么“成规”、“纪律”可以遵守。陈西滢提倡读者反映一致，效果相等。他提出“要读者读了译文所受的感动与读了原作的感受一样。他把翻译比作绘画和塑像，认为最好的翻译是神似的翻译，体现原作的“神韵”。傅雷提出“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钟书提倡“化”，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

从上述这些著名译家的精辟论述来看，他们在总体上都把翻译当作一种艺术，把翻译文化作为译语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译文越能突出民族文化的特点越好。

在西方，把翻译视为艺术的人，为数也不少。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指出翻译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美国的托尔曼认为翻译重在传神，例如画战马，不只画出它的体

形，更重要的要画出它的精神风采；苏联译论家丘科夫斯基特别强调重现原作的艺术特色，认为翻译是一门崇高的艺术。

把翻译视为一门科学的也大有人在。在我国最典型的代表当数严复，他提出的信达雅标准是把翻译视为科学的重要体现。他指出：“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义。”从严氏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他要从对比语言学上研究翻译理论，总结翻译规律。董秋斯也肯定翻译是一门科学。1950年他在《翻译通报》第4期谈到，翻译批评的困难有两种：没有一个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没有一个公认的客观标准。1951年他在同刊第4期更明白指出：翻译是一种科学。

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在1947年出版的《论〈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提出完全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显然，他把翻译看成语言科学。

苏联的列茨克尔认为：“翻译……没有坚实的语言学基础是不行的。这种基础应当是比较研究语言现象，并找出原语和译语之间的一定对应关系。在词汇、成语和文体方面的这种对应关系，应当就是翻译理论的语言学基础。”(1950)列茨克尔把翻译作为一门语言学科而成为苏联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费道罗夫在1953年出版的《翻译理论概要》中称道：翻译始终涉及语言，翻译过程实质上就是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种语言的创作活动”。

卡特福德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原语)的文字材

料替换为另一种语言（译语）的对等的文字材料”。他认为，“翻译学属于应用语言学”。（1968）

加拿大语言学家维奈和达贝内在《法英对比修辞学》一书中多处把修辞学等同于翻译理论。（1972）

奥地利学派语言学家鲍什认为，翻译理论不过是应用对比语言学，而不承认翻译理论有独立的章法。

显然上面所述的语言学家的论述，不是把翻译理论 and 对比语言学等同，就是把翻译理论视为对比语言学的的一个分支。奈达在把翻译看作语言学科以后，于1982年他在《翻译科学探索》中却对翻译作了如下的界定：“翻译的含义远比科学为大。它也是一种技能。但归根结底，完全令人满意的翻译始终是一种艺术。”1997年，他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术报告中又提出了“以翻译为目的的语法研究新方法”。这种方法强调探索词语的指称意义和内涵意义，显然，他又把翻译作为一门学科去研究。

英国翻译家纽马克则认为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他从双语互译标准化的角度，把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区别开来。他认为凡只有一种标准的固定的译法时，就具有科学性的，因而是科学的，如大量的科技术语，各个语域的专门用语、文告社交用语等。

其他许多语言不是标准化的，可以有多种译法，可以自由选择和创新，这种情况翻译具有艺术性的。

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对翻译学也有自己的看法，既看到了翻译理论 and 对比语言学的重合之处，更看到了两者的区别，他指出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对比形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际等价；二是语法结构的全面对比（词素、词、词组、子句和句子五个层次）。

从上面这些中外学者对翻译的论述，似乎可以认为，目前人们对译学的认识还处在不确定的、不一致的、矛盾的混沌状态。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混沌状态，才促使译学蓬勃发展。混沌状态不断被纯清，又不断出现，使译学理论不断发展，日趋成熟和完善。对比语言学和译学的混沌状态的纯清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应该说，对比语言学与翻译学有重合的地方，但绝不能涵盖翻译学的全部内容。尽管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都是就两种语言进行共时比较；都有着理论上的广泛应用；都是单向性对比，不可逆的。但是两者存在着根本性质的不同。第一，研究的对象不同，对比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系统，语言系统是无法翻译的；翻译学研究的是语言功能，例如表达同一概念的不同交际功能。第二，对比语言学比较的是表层结构，翻译所研究的是深层语义。翻译，必须把表层结构转换成深层结构才能进行，因为“深层结构是思想字典的接口”。(Steven Pinker, 1994) 第三，对比语言学所比较的是在不同语言功能单位中进行，对比单位的语义可以不同。而翻译，两种语言对比的语言功能的语义必须相同，否则，对翻译就毫无意义。第四，对比语言学的目的，是揭示不同语言系统的语音、词汇、语法和句子结构等语形上的异同，找到两种语言在语言形式上的共同点和不同点；翻译学是要在此基础上寻求深层语义的等值转换，等值表达的翻译标准，翻译方法和技巧。应该说，对比语言学所研究的成果可以成为翻译学的基本素材。译学理论对对比语言学也有重要的作用，扩大对比语言学研究的视野，提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因此，研究译学，必须研究语言，有了深厚的双语语言功底，只是研究译学的必

备条件。但是，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研究其自身的矛盾规律和方法论。

综上所述，翻译学就整体而言，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科学翻译是一门学科，与对比语言学有着本质的不同。

二 译学的思维学的基础

为了阐明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文化传统和哲学史。就汉民族的文化思想史而言，儒家文化是中国两千年封建文化的主体，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尽管如此，春秋末期思想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的唯物主义思想，以及儒家内部的唯物主义思想同儒家唯心主义思想不断地进行斗争。老子提出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认为“道”是“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的，因而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老子还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命题，以为一切事物有正反两面的对立，“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对立，“有无相生”的，强调无是最基本的。《庄子·齐物论》：“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天，是本然，自然。庄子认为有所是，则有所非，有所非则有所是，是非是互相对待，相因而生的。儒家内部唯物派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荀子等人。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王充在《论衡·自然篇》中提到“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不徒

耳目，必开心意”，重视理性思维的作用。到了宋明，则有兼取佛道思想的程朱（程颢、程颐、朱熹）派和陆王（陆九渊、王守仁）派的理学思想，直到清末，程朱学派的理学思想在中国思想界始终保持统治地位。显然，辩证逻辑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据极重要的位置。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

对立统一的哲学史和儒家文化的影响，使得汉语民族重知性思维，重物偶式思维、重对比思维，重悟性感知，重综合、重归纳、不注重细微分析和形式论证。这些思维方式，使汉语有许多西方语言完全没有的显著特点。例如汉语短语使用最频繁，以名词短语、动词短语和形容词短语等构句能力为最强。这些短语的构成原则并非得遵守NP+VP的结构，只要语义连接符合事理，“见词明义”就可以成为短语。短语立句时，词语之间，内部语义相互衬托，语义明确，就成句，即所谓“文字有意以立句”的句子观，也就是常说的意合法。

由于汉民族持“对立统一”的辩证逻辑，常常采用相对的和物偶式思维方式，使汉语在修辞方面也有突出的地方，例如：词汇上有表形文字，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在结构上，有结构相似的平行句法的排比结构，有字数相等，句法相似，表示相反或相关意思的对偶结构。有多用四言六言的句子对偶排比的骈体文结构。由于“骈四俪六，锦心绣口”，所以汉语行文用字有宜双不宜单的习惯。

英语民族长期受到原子主义哲学和形式逻辑的熏陶，形成了重形式论证的思维方式，强调形体描述，主形

似的心理，因此在语言上强调形合，成了一种强调形式逻辑的理性语言。重形式论证，严格按照“主项加谓项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命题。英语短语都遵循乔姆斯基的短语结构规则，即 $S \rightarrow NP + VP$ 。造句，必须用关联词把短语连接起来才能成为句子。所以加拿大语言研究中心主任 Steven Pinker 博士称英语为 SVO 语言。当然，英语也有着自由词序语言的特点，一串串介词短语在句中的词序是自由的，介词确定其后的名词在句中的功能和语义。英语还是一个重主题的语言，用介词引出主题，或把主题置于句首，使英语有着线性主题链，连接语段。由于西方民族注重严密的形式逻辑思维，英语中常常可找到严密的逻辑链，如主题链、因果链等。

三 译学的方法论

以什么观点去看译学，是方法论的根本。翻译过程充满了矛盾，因此，“对立统一”规律便是译学方法论的纲。翻译涉及语言，必须详细地占有双语对比研究的素材，正确运用思维科学，认识译学的本质和规律，研究并总结一整套具体的可操作的翻译方法。

我们认为，翻译这门综合学科，应该根据翻译文本的性质分类研究，例如文学翻译和科学翻译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应区分开来予以研究。当然，这两类翻译的过程，在理解上都要对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等进行比较研究，两者是相同的。但是由于文学创作所用的主要思维形式是艺术思维，文学语言本身就是艺术语言，作品的人物形象是艺术形象，因此翻译思维应以艺术思维为主，

逻辑思维为辅，翻译必然是艺术的再创造。科学语言作品本身是对科学或技术的描述，所用思维方式尽管有时也需要形象思维，但总是以理性思维为主的，所以，翻译语言应是理性语言，才能符合原文的逻辑思想，符合科技作品的文体特点。

翻译作品是否成功的关键，处决于翻译过程所采用的思维方式是否适当，是否正确。

翻译思维，对原文概念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知道，思维的基本过程和基本方法，是分析和综合方法。分析是在头脑里把事物分解成各个属性、部分、方面，综合是在头脑中把事物的各个属性、部分、方面结合起来。两者彼此相反相成，相互联系，分析中有综合，综合中有分析。翻译思维，具体对一个句子来说，必须把这个句子所涉及的各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再综合起来，把握句子的总体概念，才是真正抓住了本质意义。就单独翻译一个句子而言，首先是抓住其中一个主要概念，通常是名词短语，进行对比语言研究分析，然后予以理性思维，把握其准确的概念。这个准确的、鲜明的概念形成后，就以它为基础，用解数学方程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求得整个句子的真正意义。我们在思维过程中，常常犯分析不足、综合归纳有余的错误。抓住个别的、非本质的分析，结果就急于综合，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的思维方式重综合、重归纳、重悟性思维，语言高度概括精炼，这种方式，优点是重点突出，方便记忆，缺点是具体不足，模糊有余，各人有各人的理解，让人捉摸不定，无法操作，例如，翻译的标准，“重神似不重形似”、“化”境，简单的几个字就要“统治”各种翻译，怎么做得到？传统翻译技巧的增译、

省译、重复、拆译等，没有具体分析而进行的语言描述，让人怎么去执行？笔者认为，翻译标准应该视翻译文本的性质、目的等的不同而有异，才实事求是，反映翻译的本质。传统的翻译方法是有用的，但必须给它们以具体的描述。应具体描述译语和原语的语言对比和参考点，因为它们是运用翻译技巧的基础。但这绝不是说要全盘否定我国的翻译传统理论。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是根本的规律，对于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任何事物都有肯定和否定两方面。肯定是保持事物存在的方面，否定是促进事物发展和转化的方面，翻译也不例外。近十多年来，大力引进西方语言学研究成果，应用到翻译过程的分析和研究，应该说，这是对我们过去重归纳、重综合、重悟性感觉的思维方式的补充，加强综合过程中分析的因素，是我们思维方式的进步和发展。然而随着翻译的语言学派的强劲势头，出现了全面否定中国近两千年的翻译文化的倾向，例如，对“信达雅”的全面否定，对“神似”说和“化”境的全面否定，都是不公平的，也是背离唯物辩证法的。

我国传统翻译标准的核心是强调译文体现译语民族的文化特点。译文民族文化的优秀特点，在译文中体现得越突出，就越能为译语民族所接受。传统翻译理论，尽管对翻译的认识不完美，忽视了翻译过程中的许多矛盾的研究，但毕竟反映了翻译的基本概念和一些规律，就必须有分析地继承。例如，我们今天用的折叠雨伞，就经历了很长发展过程，开始是由竹子和纸为原料做成的，后来用钢骨架和布做的，都不能折叠，经过逐渐改进，成了今天的折叠伞。折叠伞有许多优点，但是仍然保留了原

始伞的能遮雨、能张开、能收拢的基本特点。如果折叠伞这些特点都没有继承下来，就不叫雨伞了。

翻译理论的进步是与整个文化发展水平分不开的。超前思维，科学的预先对于科学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存在决定意识，任何科学预见，都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经过充分的分析、综合而提出来的。思维科学的进步不仅能加强翻译科学的发展，也会促进其他学科的进步。但是超前思维，科学的预见，绝对不能全盘否定传统。全盘否定传统翻译理论是背离“肯定否定规律”的。

各门科学的方法论还必须要有自身的具体方法。翻译学也一样，有一整套的翻译方法。本书以对比语言研究的材料为基础，以思维科学为理据，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研究出一整套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

以对比语言研究为基本素材，以逻辑学为译学的理据，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探索译学的本质，研究译学的系统方法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译学专著实属罕见，本书只是一种尝试，不足之处，还望读者赐教。